

# 制度成本的研究缘起、内涵及其影响因素

张广利 陈丰

(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上海 200237)

**[摘要]** 交易成本作为一个基础性概念,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基石,但随着新制度政治学、新制度社会学的兴起,源自经济学的交易成本概念在这两个学科的研究中显见其局限性,而制度成本正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制度成本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是指投入在制度各个环节中的相关资源。在一个完整的制度周期中,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支付相应的成本,由此制度成本包括制度形成成本、制度执行成本、制度监督成本、制度变迁成本。各阶段的制度成本彼此之间并非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制度成本的高低由多方面因素共同决定,不仅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环境的影响,而且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博弈、非正式制度等同样是影响制度成本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制度成本; 利益; 博弈; 非正式制度

## The Research Origin, Connot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Institutional Costs

Zhang Guangli Chen Feng

(School of Social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China)

**Abstract:** Transaction costs, as a basic concept, are the cornerstone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long with the rise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politics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 sociology, this concept, originally an economic term, has its limitations in the research in these two fields. Now many people are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institutional costs. Institutional costs, being an objective social fact, mean all the resources devoted to each sector of an institution. In an entire institution cycle, certain cost should be paid in each period, so institutional costs contain making cost, execution cost, supervision cost and transition cost, all of which are interlinked. Institutional costs are decided by several factors, which means that it is affected not only by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environment, but also by the competition among different interest bodies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costs; interest; game; informal institutions

**[收稿日期]** 2009-07-01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09-09-20

**[基金项目]** 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资助项目(B501)

**[作者简介]** 1.张广利,男,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政策、社会资本理论研究;  
2.陈丰,男,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制度经济学、制度社会学研究。

## 一、制度成本的研究缘起

制度是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种规范,对制度这一人类社会的基本现象进行研究,是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主要课题之一。然而系统地研究制度的起源、变迁等问题却是在20世纪由经济学完成的,尤其是以科斯、诺思为代表人物的新制度经济学,利用正统经济理论研究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取得了相当成就。

交易成本作为一个基础概念,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基石。对交易成本概念的研究始自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的科斯,他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对交易成本的含义进行了阐述,认为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谁希望进行交易,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契约,督促契约条款的严格履行等等。这些工作通常是要花费成本的,而任何一定比率的成本都足以使许多在无需成本的定价制度中可以进行的交易化为泡影<sup>[1]</sup><sup>20</sup>。诺思在论述制度变迁时主要运用交易成本或交易费用的概念加以阐释,虽未直接提及制度成本的概念,但已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制度成本,他不仅指出制度最初设立时的初始成本是巨大的,就像美国1787年制定宪法时的情况一样,而且认为正式规则的形成和实施的变迁通常需要动用大量的资源<sup>[2]</sup><sup>131</sup>。

然而,随着新制度政治学、新制度社会学的兴起,源自经济学的交易成本概念在这两个学科的研究中显见其局限性,制度成本的概念被提出,并逐步对此开始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当然,制度成本是一个与交易成本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孙国峰对交易成本与制度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从交易与制度的静态关系来看,交易成本是一个大于或等于制度成本的概念。在没有形成制度以前,交易也是存在的,但它是非连续和非稳定的,这时所存在的就只有纯粹的交易成本。即使是没有达成合作的交易,交易成本相对于每个交易主体仍是存在的。当形成一种稳定的预期,也就是说当针对某种类型交易的制度产生时,交易成本就在这种制度范围内转化为制度成本<sup>[3]</sup>。

在制度起源、制度变迁等受到广泛重视时,作为制度基本理论之一的制度成本也正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与交易成本相比,对制度成本的研究只是散见于一些学者的文献中,并未形成系统性的研究成果。汪丁丁从机会成本的角度对制度成本进行了阐述,由于制度是人类社会面对稀缺的适应或回应,而在稀缺的世界里制度本身也是稀缺的,选择一种制度意味着必须放弃另一种可能的制度,因此,对制度的任何选择都是有机会成本的<sup>[4]</sup>。他认为制度的成本只不过是某个实现了的博弈均衡对每一个参与博弈的主体的主观价值而言的机会成本,而这个机会成本是由他所放弃了的那些经由他个人影响可能实现的博弈均衡的最高主观价值所决定的。

李建德认为制度的本质是共同信息,因而制度成本就是社会在形成这种信息时所需要的费用。人类社会的特征之一是相互合作进行生产活动,而任何一种生产,就其技术而言都是某种信息。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人类需要掌握的信息量日益增加,而制度的本质是人类合作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共同信息<sup>[5]</sup>。因此,在人们的意识中形成这一共同信息所必需的费用,以及在合作中由这一共同信息不足造成的损失就是制度成本。

张旭昆从制度演化角度出发,将制度成本分为创立过程中的成本和实施过程中的成本两类。制度创立过程中的成本包括失益成本、失序成本、适应成本和创立成本。前三项都是与原有制度的消失和改变有关的费用,第四项创立成本是指制度创新者为建立新制度所支出的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实施过程中的成本可分为实施成本和维持成本。前者包括实施现行制度给个人带来的收益和成本,以及从社会角度来考察的实施收益和成本;后者指实施该制度所引致的各种费用,包括纯粹维持成本和防止成本,如监督、宣传、奖惩的费用<sup>[6]</sup><sup>128</sup>。

社会学研究主要从社会资源的角度研究制度成本问题。布劳在《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中较早提出了制度成本问题,认为形成行为规范是需要投入资源的。“建立一个正式程序要求一种资源投入,它保存社会行为和关系的模式并使它们固定化。单单使一个已变成习惯的行动变明确就需要努力并使该行动过程稳定化。要建立人们将一贯遵守的规则涉及更大的成本并使行动模式进一步具体化。”<sup>[7]315</sup>

杨光斌则从新制度政治学的角度对制度成本进行了研究,分析了计划经济时期与转型经济时期的制度成本,认为权力制度化使进入市场的成本异常高昂,使得非生产性社会资源浪费异常惊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大起大落”的制度根源。中国的权力制度化所造成的制度成本,不仅具有与其他国家权力制度化相同的代价,如进入的成本、寻租的成本、腐败的成本,还有其特殊体制下的制度代价,如经济的大幅度波动和结构性经济资源配置问题<sup>[8]261</sup>。权力制度化所造成的巨大的交易费用和制度成本从根本上削弱了我们的制度竞争力和作为国家权力资源性基础的制度绩效。

总之,新制度经济学着重研究了交易成本,而并未对制度成本进行足够的研究,尽管诺思在分析制度时指出,制度形成和变迁过程中需要投入相应的资源,但并未明确提及制度成本的概念。近年来,国内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角度对制度成本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不仅试图区分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两个概念,而且还对制度成本的内涵和本质进行了探讨。但很明显,这些研究缺乏系统性,对制度成本的概念多从某一角度加以界定,很少在一般意义上阐释这一概念的内涵;虽然对制度成本的构成进行了论述,将制度成本分为创立时的成本和实施中的成本,但并未将完整的制度周期考虑在内;不仅如此,作为一种资源投入,制度成本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也并未得到说明。因此,要更好地解释人类社会的种种制度现象,无论是纵向研究制度起源、制度变迁,还是横向研究制度比较等等,制度成本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概念。一个国家在技术、劳动力素质等条件基本不变的情形下,制度的变革为何能使制度收益远大于制度成本?同样一种制度在不同的国家地区为何会有不同的成本?在社会转型时期,制度成本具有哪些新的特点?这些现实问题是制度理论研究中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重要社会现象。本文拟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社会学等理论,结合博弈论相关观点,对制度成本进行理论探讨,试图解释制度成本的内涵及其构成,分析不同环境、利益博弈、非正式制度等如何影响制度成本,进而从理论层面对制度成本作一初步厘定。

## 二、制度成本的内涵及其构成

人类社会形成后,逐渐生成了各种社会制度,正是这些制度构成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自老制度主义提出以来,人们对制度内涵的界定并不一致。如凡勃伦认为,制度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种关系或某种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sup>[9]139</sup>;康芒斯将制度定义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sup>[10]387</sup>;而新制度主义学者诺思则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sup>[2]3</sup>。然而,制度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规范,在发挥作用的同时必然需要投入相应的资源,或者说需要支付一定的制度成本。

制度成本是指以制度设计为起点、以制度变迁为终点的整个制度周期中所产生的一切耗费,是实现不同主体之间利益博弈而产生的成本。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既包括经济成本,又包括政治成本、社会成本、文化心理成本等方面。这一定义具有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任何制度的形成、执行、变迁等都要消耗一定的社会资源,即需要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各种社会制度产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取得相应的制度绩效,或者说制度收益应当大于制度成本。第

二,从根本上说,制度是利益主体之间的较量和博弈。个人、各种组织包括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都是具有不同利益的主体,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必然的,而制度正是利益主体之间的一种博弈均衡。第三,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有所不同,根源于社会的各种制度反过来又会对社会产生种种作用和影响。制度不仅仅需要经济资源的耗费,而且还要有政治资源、社会资源等方面的耗费,因而制度成本的表现形式包括经济成本、政治成本、社会成本和文化心理成本等。

与交易成本一样,制度成本也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社会事实。在一个完整的制度周期中,从制度的形成、执行、监督到制度的变革,其中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支付相应的成本,由此制度成本包括制度形成成本、制度执行成本、制度监督成本、制度变迁成本。

制度形成成本是指制度在其制定过程中产生的各种耗费。在制度形成过程中需要花费一定的信息成本,包括收集信息的成本和加工信息的成本,即一方面需要获取与制度相关的各种信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此阶段所需要掌握的信息越来越多,而网络等通讯方式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信息获取的成本;另一方面由于各种信息庞杂,必须要对它进行相应的加工,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信息量日益增加的现代社会,信息加工的成本必然不断增大。制度形成其实也就是一个决策过程,主要包括集权式与民主式两种模式。前者是根据少数专家甚至个别领导权威的意见,在较短时间内制定出相关制度,这种制度形成模式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较少,时间效率较高;后者是在制度的产生过程中,进行广泛的民众咨询、讨论甚至公开辩论,并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表决,在此模式下参与制度制定的人数较多,有利于制度制定的公开化、民主化,但极可能带来相对较高的成本。

一定社会或共同体建立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在制度,因此制度建立后的一个必然环节就是制度的执行和运作<sup>[11]78</sup>。制度在其执行过程中,除必要的资源投入外,必须保证制度不走样,如果制定出来的制度得不到有效执行,那么肯定会增加额外的执行成本。然而一个经常性的难题是,制度在遭遇潜规则时如何能够有效执行?社会生活中存在大量的潜规则,在特定情形下,人们为遵守潜规则可能放弃正式的制度安排,或者在两者之间徘徊。究其根源,一方面是潜规则力量过于强大,使得人们宁可违反制度也不愿违背潜规则;另一方面,制度的硬约束力量不足,即便不遵守制度约定,仍可以逃避相应惩戒,在此情况下,制度的执行成本必然大大增加。为此,制度的严格执行不仅需要提高制度执行者的素质,使之对制度有较好的理解和领悟,而且有必要加强制度的硬约束力。在制度执行中,往往直接或间接地牵涉到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损益关系,尤其是现代社会中,由于利益主体的分散化和多元化,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和不同层次上林立着为数众多的利益主体,它们之间的相互博弈必然影响制度的执行成本。

制度要得到有效运行,就必须进行相应的监督,有效防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发生。监督不仅需要成本,而且监督成本还是决定管理有效性的核心因素。制度的监督成本主要包括设立监管部门,以及实施监管过程中所需的硬件设施、组织运作、监管人才培养等相关费用。制度监督成本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即监督者的素质、监督机制的完善程度和监督对象的数量。具体而言,监督者的素质越高,监督机制越完善,监督对象数量越少,监督成本则越小。

制度变迁的根本目的是增加社会收益,提高社会经济活力和社会成员生活水平。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必然遇到来自旧制度中既得利益者的阻力,每一项制度的立与废都要牵涉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因此利益受损的一方很可能有意阻挠对他们不利的改革;同时由于新制度不够成熟,旧制度在很多地方依然发挥着作用,两种制度的并存将会导致旧制度对新制度造成阻碍,此两种阻力构成了制度变迁的摩擦成本。制度变迁形式包括渐进式变迁和激进式变迁,前者变迁过程相对稳定,不

会引起大的社会动荡,但所需时间较长,需要支付较高的时间成本;后者是在较短的时间内,采取果断措施进行制度变迁,时间成本相对较小,但社会风险较高,甚至可能会引起社会动荡,如处理不善,则可能需要更高的制度变迁成本。

制度形成成本、制度执行成本、制度监督成本以及制度变迁成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制度周期中的制度成本。很显然,各阶段的制度成本并非孤立的,彼此之间不仅相互联系,而且相互影响,其中制度形成作为整个制度周期的逻辑起点,对其后的各阶段具有显著的影响。颁布的制度如果思想过于超前,可能会由于缺乏配套的制度而无法操作;如果设计比较保守,未来当其他制度颁布时,又可能会影响它们的实施<sup>[12]180</sup>。制度形成从其本质上说是一个利益的博弈过程,不同的利益主体在不断较量和重复博弈中走向均衡。在制度形成过程中,集权模式固然可以减少制度形成成本,但由于制度执行者、承受者缺少参与机会,并且与制度制定者之间缺少必要的沟通、协商,或者说利益主体之间未能进行必要的利益博弈,从而容易增加制度执行的阻力,导致制度执行成本的增加。与之相反,民主模式下的制度形成过程,尽管因参与人数较多和花费时间长而增加成本,但制度执行的阻力却要小得多。制度的监督成本相对复杂,一项制度如果能够得到较好的贯彻落实,即使遇到阻力仍因执行者恪尽职守而得以坚定执行,并发挥出应有的制度绩效,则监督过程相对简单;反之,如果由于少数人的利益驱动或人情关系的羁绊,制度执行不畅,那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制度的监督成本。当然,制度监督成本的高低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包括人大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公众监督在内的各种监督方式能否形成合力,监督体制能否理顺等等,而制度的执行状况仅仅是影响制度监督成本的其中一个方面。

### 三、制度成本的主要影响因素

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说,制度是重要的,这一点已经没有任何疑义。当今社会,国家、民族之间不仅是人才的竞争,而且也是制度的竞争,而以较小的制度成本争取较大的产出则是制度竞争的重要方面。有学者对影响制度成本的因素进行了研究,认为制度成本主要受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行为、资产专用性等影响,但很显然,这种观点沿用的是影响交易成本的因素,并没有超越交易成本的研究框架。制度成本与交易成本之间显然是有区别的,前者研究的着眼点是整个制度周期,是在宏观视野下对制度过程中耗费资源的考察,这与后者侧重于市场交易过程有着明显差异,因而不能用影响交易成本的因素解释制度成本。

制度成本的高低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一般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制度成本越低,意味着制度消耗的各种资源越少,制度越能够发挥相应的作用。然而,并不能因此简单地说制度成本越低越好,人类社会越发展,社会越复杂,则制度形成、执行、监督、变革等过程中所支付的成本就越高。因此,从历时角度看,当下制度消耗的成本很可能会远高于以前,但并不意味着以前的制度就一定比现行制度优越。

不同环境下的制度成本是不同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等方面都会影响到制度成本的差异。各个国家所承担的制度成本是不同的。就已进入工业社会的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经历了过渡时期的洗礼,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充分,社会运行机制相对完善,社会成熟度也较高,其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在经过较长时期的运作修改后显然比较健全,因而制度成本相对较低。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制度成本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的法制观念和意识比较薄弱,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市场经济体制未建立或未得以充分发展,社会保留着较多的传统做法,如人情在一定程度上代替法律,一些地区的风俗习惯甚至比法规更重要等等,因而这些国家的制度成本相对较高。总体来说,在市场经济发展充分、法律制度

较规范、社会相对成熟的国家中,制度成本的耗费相对较小。

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同样存在制度成本的变化。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改革促使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体制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迁。改革开放后,在技术条件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很显然,这是一次成功的制度变迁,其制度收益远高于制度成本。然而,我国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各种社会制度不够健全,且传统文化的影响至深,人治而非法治的传统尚存,人情大于制度的情况时有发生,导致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制度运行的成本大为增加,而林林总总的制度漏洞又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监督成本,从而使我们不得不承担较高的制度成本。另一方面,我国的渐进式改革虽然避免了可能出现的社会动荡,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发展,但这种改革模式需要支付另一种形式的制度成本,如价格双轨制所滋生的腐败,新旧体制较长时间共存导致的社会摩擦等。近年来,我国的经济每年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GDP总量已位居世界第四,但老百姓勤劳而不富有却是不争的事实,这其中有多重原因,而较高的制度成本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是影响制度成本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制度作为被制定出来的一系列规则,实质上是一种利益的博弈。每个个体、组织在利益的驱动下存在着种种博弈行为。利益博弈现象是普遍的,不仅存在于制度制定者、执行者、承受者之间,而且发生于他们各自内部之间。这种利益的博弈分为恰当的和不正当的,恰当的利益博弈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在合理范围内进行的博弈,有利于减少制度成本,而不恰当的利益博弈则会增加制度成本。

在利益博弈过程中,政府作为主要的制度制定者,应当保持相对超然的地位,以保证其超越性与公正性,即应积极创造和疏通多种合法的表达渠道,了解并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建立利益博弈的合理规则,从而保障利益博弈能够健康有序地进行,以促进相对和谐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形成。然而制度制定者本身也是一个利益主体,同样存在着对自身利益的追求,面对社会利益的冲突,决策者倾向于首先支持有利于维系自己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的要求,而不是考虑一种普惠的制度安排<sup>[13]52</sup>。尤其是不同的制度制定者之间存在着利益的竞争甚至冲突,或者说由于层级和职能的不同划分,形成了不同层级以及同一层级中不同职能部门的制度制定者,他们在博弈过程中都有其自身的利益取向。制度执行者是制度得以有效运行的关键:一方面执行者必须保证制度的贯彻、施行,这是其工作职责使然;但另一方面作为重要的利益主体之一,制度执行者具有利益最大化的冲动,在与制度制定者、承受者的博弈中,会通过各种方法谋取本部门的利益,因此,制度执行者的执行权力必须受到相应的监督,不仅要防止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变形、走样,而且要防止攫取制度外的收益。相比之下,制度承受者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可能因为制度而产生利益获得或利益受损。在民主意识缺失、民主机制不健全的社会中,制度承受者常常由于缺乏足够的话语权而利益受损。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这一群体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民主意识不断提升,必然会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来影响制度的制定,或是减少制度执行过程中对自身利益的损害,在与制度制定者、执行者的利益博弈中争取应有的话语权。

非正式制度是影响制度成本的又一因素。非正式制度安排是指人类在长期交往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总和,其中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对社会发展具有深层次的影响作用。从制度起源来看,先有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然后在此基础上形成正式法律规章等各种社会制度,所以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尽管非正式制度不具有国家强制性,不能像正式制度那样对社会行为进行强制性约束,但由于非正式制度作为社会运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成员的规范作用经常以无形的方式表现出来,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产生间接的作用。非正式制度对制度成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对制度层面的影响,包括意识形态、道德习俗在内的非正式制度,对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等方面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制度的制定、执行、监督不可能脱离社会实际生活,必然要受到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而制度的社会成本、文化心理成本受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尤为明显。二是通过对人的作用间接影响制度成本。在社会制度从形成到终结的制度周期中,人无论作为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还是承受者,对制度的内容和形式、结构和功能等都起着决定性作用,制度成本的高低归根到底取决于人。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可以内化为人的思想和行为,从而影响制度成本。

### [参 考 文 献]

- [1] [美]R. 科斯、A. 阿尔钦、D. 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刘守英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R. Coase, A. Alchain & D. North, et al, *Property Right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trans. by Liu Shouying,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5.]
- [2] [美]道格拉斯·C. 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D.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rans. by Liu Shouying,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 [3] 孙国峰:《交易成本与制度成本的关系分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68-72页。[Sun Guofe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action Cost and Institution Cost," *Journal of 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2(2004), pp. 68-72.]
- [4] 汪丁丁:《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经济研究》1995年第9期,第72-80页。[Wang Dingding, "From Transaction Cost to Game Equilibrium,"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No. 9(1995), No. 72-80.]
- [5] 李建德:《论“制度成本”》,《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44-49页。[Li Jiande, "On Institution Costs," *Journ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No. 1(2001), pp. 44-49.]
- [6] 张旭昆:《制度演化分析》,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Zhang Xukun, *An Introduction to Analysis of Institution Evolution*,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 [7] [美]彼得·M. 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李国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P. M. Blau,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trans. by Li Guowu,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Co., Ltd., 1988.]
- [8] 杨光斌:《制度的形式与国家的兴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Yang Guangbin, *Institution Form and Country Vicissitude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 [9] [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T. Veble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trans. by Cai Shouba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1.]
- [10] [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卷),于树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Commons, *The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 trans. by Yu Shushe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62.]
- [11] 宋增伟:《制度公正与人的全面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Song Zengwei, *Reasonable Institution and People's All-round Development*, Beijing: People Press, 2008.]
- [12] 过勇:《经济转轨、制度与腐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Guo Yong, *Economics Transition, Institution and Corruption*,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7.]
- [13] 董海军:《转轨与国家制度能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Dong Haijun, *Transition and State Institution Capacity*,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7.]